

# 今日評論

第 四 卷 第 九 期

這一週

教育與經濟

權力與效率

論翻譯

在生產戰線上的婦女（賈霽通訊）

舊詩與新詩的節奏問題（下）

陳友松

羅隆基

賀麟

任柱明

孫毓棠

國民二十九年九月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 這一週

據東京二十一日合衆電，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頃已命令召回駐外外交官四十人，其中有大使五人，公使十九人，參事五人，總領事十一人，此外外交官人選，亦有大規模之變動，聞外務省內部亦有更迭。被召大使中有駐美大使堀內，駐巴西大使川島，特使河田及駐法，駐土，駐華大使等。這種大規模的更動，在日本外交史上確屬創舉。日本外務省內本有傳統與革新兩派的對立，革新派雖仗軍部的支援，九一八後在白鳥，栗原等的領導下，一度非常猖獗，但終敵不過傳統派的反攻，重要人物大都被放逐爲駐外使節。德蘇協定後，革新陣營更受嚴重的打擊，而銷聲匿跡。所以軍部及法西斯份子視外務省爲穩健勢力的大本營。目傳統派爲歐美追隨主義的軟弱者。松岡登台後，既欲追隨軸心外交，對英美將採取攻勢外交，故對外務省內的傳統派勢必大批更動，這是一般人對於日本外交人員大更動的普遍感想。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日本外務省向爲傳統派所盤據，革新派雖整日叫囂，終無濟于事。松岡這次將利用時機，排斥傳統派，擴張革新份子的勢力，斯以這次大更動，除了政策上的關係外，還含有內部派別排擠的作用。不過革新陣營中的外交人材爲數甚鮮，究竟如何補充，至值注視。代理外次大橋忠一頃向日本報紙記者發表談話，謂日本外交已進入新階段，此後凡屬幹才，不次擢升，外交官之任命，不擬限于外務省內人材，即記者亦得出任外交官云。日本外交官的任用向極嚴格，這種優良的慣習恐將打破，老成引退，孺子登台，日本外交的前途，從可知矣。

近衛爲改組內閣機構，建立新政治體制起見，已選聘委員二十四人，從事準備工作，其中人選大部爲右翼革新份子，以前力主無德義締結軍事同盟之急進份子如末次信正，橋本欣五郎等均被選爲委員，故咸料「新體制」

必將具備全國國家政制之色彩。聞一新體制一內容將以中央指導部爲核心，指導全國各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運動，並組織國民會議，聽取國民意見，議員三百人，一部民選，一部由議長（首相兼任）選派，其中包括職業團體代表及各地區域代表。但國民會議並非代替議會，故議會仍繼續存在。這種架床疊屋的改革除了對於人民的政治，經濟，思想等活動，加以更嚴格的限制壓迫，毫無他種意義可尋。現在日本國民所希望的是趕快出現一強力政府，結束對華戰事，解救內外危機，並不是要他們來加強對內控制。所以新體制運動恐成事不足，而擾民則有餘。日寇僅炫于德義實行法西斯政制之表面成功，而盲目效顰。畫虎不成，恐將反類狗矣。

倭赴荷印特使經數度考慮後，決派商相小林二三充任。日本對荷屬東印度的野心，在德軍侵荷時即已暴露。松岡外相在宣佈外交政策中，更公開宣聲「日本之最終目的，則在建立一安定區域不僅包括日本一滿洲國」及中國，并復包括越南荷印云。」所以小林的這次赴荷印，將提出種種苛求，除垂涎荷印的煤油，橡皮，錫礦等軍需資源外，對於日貨市場之擴充，日本移民之便利案，亦必將提出要求，總之將設法使荷屬東印在經濟上成爲日本之附庸。目前日本因美國態度之強硬，對荷屬東印不敢武力攫取，故想先從經濟侵略着手。不過經濟侵略本身即足以亡人之國。且常爲武力侵略之先驅，荷印當局及在南洋有利害關係的美英諸國能坐視日寇遂行其詭謀嗎？

法倭關於越南這段交涉，到了什麼階段，將成怎樣結局，目前還是個懸謎。據各方傳說，則維琪政府還是維持他的屈服到底的政策。據說，維琪政府已接受了倭寇關於越南的幾項重要條件。照此推測，假使倭寇在越南登

降。越南或不出以抵抗。對這種不幸的局面，我們始終認定，這是法國的損失。這是英美在太平洋地位的威脅，與我中國的抗戰前途，却不能發生重大影響。倘法國經過抵抗而失落越南，這總比拱手將殖民地讓與他人好些。這不止是國家利益問題，最少，經過抵抗，還留了他年法國復興以後重新收復失地的遺地。法國維琪政府根本不作法國復興之想，那就非我們所知了。倭寇掠奪越南，我們認定他的唯一目的，還是取得南進政策的海陸空軍根據地。他的對象，還是英美，至於由越侵滇，日寇或不至作如此妄想。日寇果有力量對我作進一步的侵犯，則道路甚多，固不必舍近求遠，繞道越南。在其他戰區已成戰場不支之局，彼日寇又何來餘力，在越滇邊境再開一新戰區。並且由越侵滇，道路崎嶇，易守難攻，敵寇果冒險而來，亦自取敗辱而已。姑退一萬步再說，即今日寇真能由越侵入雲南，充其極，雲南再成我方一大規模之遊擊區而已。充其極，再擴充我國對日寇殲滅消耗的範圍而已。此於日寇所夢想的提前結束中日戰事，有何效用？故對越南局面，我中國只須沉着觀察，準備自衛，即此即足以應付。我政府及人民絕無過分憂慮與張惶的必要！

美國與加拿大近方討論聯防事宜，兩國委員會自七月二十六日起在東京開會。按聯防事本由美方提議，而羅斯福總統及史汀生陸長實爲主張最力者。爲表示與黨爭無涉起見，羅氏且以不屬於共和民主兩黨之紐約市長拉加迪亞爲委員會之領袖。聯防的結果或將使美可以離中立法而助加拿大。加拿大爲英帝國的一份子，對德國又爲交戰國，美之助加，等於助英。這似乎是美方提議聯防的真意所在。證以美向英租借西半球海空根據地之舉，益信美之用意在間接助英，而不在直接增厚國防。國際觀察者多謂最近二三旬來英美關係在加強中。我們深望這觀察是準確的。英美唇齒相依，英國離了美國，固難自保；但英國既亡之後，美國即欲自保，亦有所不能。如願露爾海將美澳聯防的主張亦得實現，英美互助的範圍更可擴大，則不僅是英美之福，暴日的野心亦可大戢矣。

數週來辯論甚激的徵兵法案已通過美國國會。根據這個法律，同時受訓的男子不得過九十萬人。受訓的隊伍只能開至美國本部及美國屬地。換言之，美國國民軍雖不開至菲律賓作戰，却不能開至歐洲或亞洲大陸作戰。但這已是政府方面的大大勝利。如照孤立派的主張，則徵兵根本沒有必要。即使有了徵兵，也不能開至非島作戰。今法律不禁開往非島，很可看出國會大多數並不願美國放棄在遠東已有的地位也。

英哈立法克斯外相近又聲明英決尊重對希的約言，如有侵希者，英必以全力助之抵抗。原來英在巴爾幹半島，對土耳其、羅馬尼亞及希臘均有約言。羅馬不守信義，投了德國之懷，故約言自然失效。土耳其尚未至被侵的時期，故約言是否有效尚難預測。惟有希臘，則因義大利藉口暗殺案件，大有陳兵入侵之勢，故英有誓同盟守的宣告。此種宣告，在英本爲當然。英義既爲交戰國，助希本是攻義，於英自然有利無害。所可懼者，即希臘因不敵義或先投降，致又陷丹麥等之復轍耳。

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於本月二十日在墨西哥城遇刺，頭部被砍破裂。於送入醫院後，因傷勢過重，已於二十一日逝世。托氏是俄國十月革命兩大領袖之一，與列寧共同創立社會主義的蘇聯。托氏生於一八七七年，在青年時期便參加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他變成列寧的得意助手，輔助布爾雪維克黨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後他任蘇聯外交部長之要職。一九一八年他改就軍事革命會議議長，主持俄國軍事，管不顧一切的阻力，取消義勇隊制度，起用舊帝時期的將校，成立適合於近代軍事科學的正規隊伍，一手創立有名的紅軍。一九二四年列寧去世，他於一九二五年被擢去軍事上各要職，一九二七年被開除蘇俄共產黨黨籍，一九二八年被放逐出國。在國外流離多年，而最近竟被刺客所死。一代英雄，乃竟不得善終，而死於亡命之地，刺客之手，此殆人類自處之道未得其道歟！

用孔子聖誕日（八月二十七）為教師節，這種日期的選擇的確妥當。一方面，使全國國民有尊師重道的懷想。一方面，更使為教師者追慕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如今真值得提倡。這裏所謂的「尊師重道」，並非恢復「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那套舊禮教，並非提倡往日童蒙私塾中學生揖而進，揖而退那一套。老實說，今日不尊師，不重道者並不在青年學生，而在政府，而在社會。現代潮流，政府及社會每每把教師看做一種工具，用做一種工具。「拿了公家錢，吃了公家飯，要你怎樣幹，就得怎樣幹」，政府對教師大有這種態度。教育本身的學問及修養，教師本身的個性及品格，不算一回事。隨便可以糟蹋。任何人想吃教師這碗飯，姑無論你的學問及品格怎樣，在思想上他却應接受一套東西，而後再做那套東西的留聲機。所謂工具者此耳。今日做教師真正的痛苦或亦在此。幸也，孔子生於二千四百餘年前的中國，那時候還沒有學術統制那套新花樣，他還可以自由與弟子講學。倘不幸，孔子生於現代，先受思想統制，再受書本檢查，對弟子既不能「吾道一以貫之」，復不能修春秋，述禮樂，雖有孔子亦不能成其為大聖矣。這當然是孔子聖誕日值得國人深思的一點。這亦是教師節值得國人為教師設身處地深思的一點。

最近不少的學校又要再度遷移。例如同濟大學要從昆明遷往四川，中山大學要從江遷往粵北。這些學校在抗戰以後，已經幾度的遷移了。現在又要再度遷移！我們認為教育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對整個大學教育問題加以新的考慮。第一，在這戰爭的時期，我們是否對每一個大學都有維持之必要？我們認為政府可以把若干成績較差的大學，歸併到成績較佳的大學。每省只要有一個（或至多兩個）大的大學，便很够了。第二，現在大學的分配

是否合理？我們認為現有的分配是很不合理的。現在最大的毛病，是後方大學太多，前方大學太少，因此若干有地方性的大學，應該遷回其原有的省份。從這一點看來，中山大學移回廣東，是一件值得稱讚的事。但應該遷回原地的地方還多得很呢！第三，現在大學已經太多，絕對沒有再增設之必要。最近某某的地方還在籌設新的大學。如果那地確有設立大學之必要，何必不從他處遷移一所大學到那個地方呢？

九月一日，全國新聞記者熱烈舉行記者節。他們利用這節期，舉行徵募寒衣運動。這總算舞文弄墨的文人，在抗戰期中，各盡所能，各盡其責的一種表示，他們的精神，值得敬佩。新聞記者本是社會上一種很有權力的職業。西諺「無冠之王」，是指新聞記者說的。從這個尊貴的徽號上，就可看出新聞記者當年的權威了。新聞記者所以取得這種權威，還是民主政治的恩惠。民主政治的運用，靠兩個重要工具：（一）政黨；（二）輿論。輿論是民意的發表，政黨是民意的組織。所以民主政治又可名之為民意政治。忠實負責的新聞記者，即在聽取民意，採擇民意，發表民意。「無冠之王」的地位就從此取得。民主政治衰落，獨裁政治抬頭，新聞記者由民意的代表者，成了官家的代言人。他不是「無冠之王」，他是「王者之冠」，換言之，王者的工具了。王者要說什麼，他說什麼；王者不許說什麼，他不敢說什麼。新聞記者的消息是官報，新聞記者的議論是官旨。新聞記者的自由意志當然沒有了。新聞記者的尊嚴當然亦沒有了。民主政治衰落之日，即「無冠之王」的王位倒塌之日。這又是我們在記者節的感想。不知一班新聞記者有同感否耳？

# 教育與經濟

陳友松

教育與經濟的隔絕，自哲學的眼光看來，也許是起源於精神與物質對立的二元論。教育是精神事業，經濟是物質事業，教育是消費的，經濟是偏於生產的。富而後教，「行有餘力以學文」；換言之，教育的發展，須待生產發達經濟繁榮以後。這種傳統的二元概念，是普及教育與增進教育經費極大的障礙，也是吾國過去經濟財政學術不發達的原因之一。儒家的思想，嚴利之分，輕貨財之事；教育的領域是德行道義，乃君子之事，經濟的領域是貨殖聚斂，乃小人之事。子罕言利，樊須是鄙，德本財末，再求可攻。於是教育者的本分爲清高困窮，教育事業日與生產隔絕，演成數千年來治術教育消殺教育與資本教育的拾頭，勞心勞力，判然二途。直到近年以來，始將生產與教育並論，自孫中山先生揭發其民生主義以後，教育家們才漸覺悟教育即社會生產之說，教育與經濟才經過辯證綜合的過程有打成一片之趨勢。這是現代的觀念：教育是經濟，經濟是教育。教育是生產的；教育者是生產者，也是生產者的生產者。經濟學家李斯特批評世人謂養豬是生產事業，而反對教育兒童培養人的資源爲消費事業，實不通之教。現代經濟學者日益重視教育爲經濟的要素了。先從亞當斯密說起，他把一國人民的天賦與習得的才能算爲其固定的資本之一，並謂「凡是用以訓練青年的一切支出，雖是消費目前的價值，終是爲了培養生產能力。」李斯特云：「心智的生產愈能促進民智，增進知識，則物質的財富愈能同樣增加。」馬休耳（Marshall）云：「關於教育的集體投資，我們是否已達到應有的程度呢？當代的經濟學家必一致贊同說這種支出是真正的經濟」。塞利格曼（Sellman）云：「教育，簡言之，即是所以辨別進步與落伍社會的一切優點。它能增高工資，因爲能增加生產」。費爾傑德（Fairchild）云：「公共教育的經濟效力，無庸誇張其辭，因爲國民是生產者，及所生產物品之應享受者，爲財富的消費者

，國民所需要的性能皆以所受的教育之程度與性質爲決定因素，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的經濟優越，中國與印度等國的經濟落後，無疑地大部份是因爲教育的差別。讀者如果了解生產的條件以及財富之分配與消費的基本原則，則知教育在經濟領域有極大的重要性，不必再加引證了」。美國教育行政學泰斗史垂葉（Stayer）與哥大公共財政教授，海格（Hager）在其合著紐約州教育財政一書有云：「教育制度產生技術的精巧，增加生產的能力，可以提高人民的智德標準，準備他們聰明地參與國家的政治。在近年來教育已表示在人民之社會性能即與經濟有極大關係的性能——例如健康與節約——能有效地改進。教育在欣賞與鑑別之培養也有重要的貢獻，所以決定社會所要求所消費的經濟貨財與勞務之品質。……至於科學研究的投資，對生產力的擴大含有夢想不到的可能性。據赫胥黎云，巴斯傑在獸醫上的發明每年增加法國的財富，其總數等於一八七〇賠款的全數」。一九三七年英經濟學泰斗皮古（Pigou）著有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一書，會有一句極重要的警告：「一切投資中最重要投資還是人民三育上的投資。政府在這裏主張節約，可以說是一種罪犯的行爲」。（原書一三七—一三八）。

還有些經濟學家把教育當爲經濟建設的先決問題，例如唐勒（D. H. T. Le Roy）在其中國之土地與勞動一書有一結論云：「在中國任何大規模的經濟改進，必須先發展一完備的公共教育制度」。此與吾國近年來多次發表的經濟建設計劃大異其趣。他們似乎忘却了孫先生的實業計劃還配置有心理建設計劃。他們假設我們已有了各級技術大量的幹部，因之所擬定的龐大投資，並無分文計及人才的訓練，當然無暇顧及全國民智之開發。年來人人美稱蘇聯的三個五年大計劃，謂吾國當迎頭趕上，於是建議如何發展交通，開發農礦等。言之娓娓動聽，如數家珍！但這些談計劃者很少有人注意或積極與

教育界携手建立一个全盘的干部训练计划，以配合其经济建设计划。只有吳景超等一二人注意及此，但不過談談而已。固然這是教育部的責任，然所謂教育合作委員會與有限之生產教育經費，其力量則甚微。過去的全國經濟委員會，雖有教育專門委員會之規定，然終是「繫而不食」。固然教育部最近又有所謂國民教育五年計劃，然國民教育也不過是一最低限度之基礎，至於大量的技術幹部之訓練，則仍有待於經濟學家與建設當局之共同負責。因需要有大規模的計劃，必須要有大規模的投資的經濟財政當局，決不可只計魚而不計其筌。

如果我們拿蘇聯兩個五年計劃已培養的建設人才統計為根據，用人口的比例推算，則我國需要培養八十萬個各種工程師技術與管理人員，二十三萬農業技術幹部，二十四萬科學家教授與學者，四十萬醫生，三百萬教師，同時我們需要一個能容納九千九百萬大中小學生的學制。有人說，在戰時要這樣幹等於痴人說夢。但我們的側重點是至少要看人家如何把教育與經濟打成一片，計劃得有條有理，絲絲入扣，至少在該西南建設的時候，對教育的配合計劃有同樣的關懷。經濟建設之重視教育，在各國有很多的例子，可以從教育經費的比類看出來，蘇聯的第一次五年經濟計劃中，教育投資為一百四十五萬盧布，佔全計劃決算百分之十一點七；第三次五年計劃，第一

## 權力與效率

現在社會上有些人認政治權力是政治效率的唯一條件。他們的見解是這樣：政治效率的大小，以權力大小為比例。政治權力愈大，則政治效率愈高；政治權力愈小，則政治效率愈低。準此公式推演，則增高政治效率的唯一方法，就在增高政府的政治權力。依據這個公式，他們還得到一個結論：獨裁政治勝於民主政治。因為獨裁是權力獨攬。權力獨攬，則權力集中，如此則政治效率自然優良。民主政治是主權在民。主權在民則政治受民意的牽制

年之教育經費佔全部預算百分之十七。除了政府預算以外各部門經濟組織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曾投資二十萬萬於社會文化的建築與設備方面。我國全國政府預算在一九三六為十五萬萬（有些縣報告不完全），而全國公共教育為一萬四千六百萬，不到總數的百分之十。美國早年為發展生產起見，曾大規模撥公地以維持所謂公地專門學院（Land Grant Colleges），又設立聯邦職。教育局，每年撥給生產教育費平均達七千餘萬美金。美國農業部的經費，在平時為聯邦各部第四位的大支出。據報告云，其主要事業是教育性質的研究實驗與推廣教育工作，佔其支出的絕大部份。英國的農業教育經費是農業部擔任的。比利時的農業部用其支出之三分之一於教育上，其實業部的教育經費佔全部預算百分之十二。有為者亦若是，我國如欲發展經濟，普裕民生，經濟與財政當局，自宜首重教育投資。不但要負起生產教育之投資的責任，而且要把教育視為已事積極與教育當局携手繼續不斷地使教育計劃與經濟計劃打成一片。同時對於普及教育的經費，應當毫無吝嗇地大量籌集。因為普通教育也是大有經濟效力的。總而言之，教育與經濟是一件事的兩方面。教育是生產事業，教育的投資是一切投資中最重要。教育自教育，經濟自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

羅隆基

拘束。如此，則政府無權。如此，則政治效率低落。在當前，他們還自認這種理論得到了强有力的證例。這證例就是德法之戰，就是希特勒獨裁政治戰勝法國的民主政治。這一套理論，如今却做了中國一部份人反對民主，保護獨裁者的根據。

這次歐戰，希特勒之所以勝，法國之所以敗，本刊四卷一期「歐戰與民主主義的前途」一文中，作者已有所說明，姑不重複。這裏我們只討論的只

是政治權力與政治效率的關係。

政治權力是政治效率的唯一條件？「政治效率的高低，以政治權力大小為比例」，這公式果然真確可靠？我們首先要討論這些問題。我承認政治效率相當依賴政治權力。政府絕對無權，政治依然有良好效率，這是不可能的。政治本來是管理衆人的事務。政府是管理衆人事務的總機關。總機關毫無權力，指揮不靈，號令不行，政治效率當然無從說起。反之，政府有了極大的權力，政治效率即有了保障，在我看來，這亦是錯誤的觀念。這裏，當然牽連着「效率」兩字的意義。「效率」兩字，通常人看作「迅速敏捷」。凡事能够迅速敏捷完成，通常即認效率優良。其實在研究行政學的人的眼光中，則「效率」兩字的意義，不如此簡單。此間牽連着時間，精力，及物力的經濟在內。某一事件，能够用較少的時間，精力，及物質以完成，且得到滿意的結果，這是經濟。這是效率測量標準。這是效率的一種定義。進一步，政治效率還牽連着道德的涵義在內。那是說政治效率的測量標準，不是時間，精力，及物質等等，而是社會福利。政治上某一事件，社會以較少的犧牲，換取較多量的福利，那是效率優良；反之，社會以較多量的犧牲換取較少量的福利，甚至只有犧牲，絕無福利，那是效率低劣。這些定義那一個為合理，那是後話。我們且先依據通常人的定義來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少數人認權力為效率唯一條件者，其着重點亦只在「迅速敏捷」四字。在他們眼光中，政府有了權力，能決能斷，能命能令，要做某事即做某事，既非一國三公，又非築室道旁，如此，事件最後對社會影響如何姑不論，但在做事本身上最少可以迅速敏捷完成。這是主張權力為效率唯一條件者的見解。他們羨慕希特勒的成功即在此。他們醉心獨裁主義亦即在此。

政府有了權力，能決能斷，能命能令，在做事上即能得到迅速敏捷的成績，這見解即未必真實可靠。一方面，希特勒固然是「有權力即有效率」的好證明。他方面，有權力不一定即有效率，證例亦舉不勝舉。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君主制度。中國並且是君主專制制度。君主專制，政府總是有權力，皇帝總是能決能斷，能命能令。在中國歷史上，皇帝在政治上做到迅速敏捷的成績者，固然有人。然而拿整個中國政治歷史來說，政治效率低落是常情，政治效率優良却是例外。這話或者太籠統，太空泛。我們且拿當前的政治事實來說。中國今日為獨裁政治，誰亦不能否認。中國今日為人的獨裁抑為黨的

獨裁，姑不具論，但中國今日為獨裁政治是事實。中國今日政府，絕對能決能斷，能命能令，那亦是絕對不容否認的事實。中國今日的政府，絕對不受憲法的限制，絕對沒有議會的拘束，那亦是絕對不容否認的事實。今日站在領導中國政府地位的人，他在權力上能決能斷，能命能令，他的權力絕不在任何獨裁領袖之下，那亦是事實。然而今日中國的政治效率又如何？一切政治設施，果真能迅速敏捷以完成？一切政治設施，果說得上效率優良？倘希特勒是「有權力即有效率」的證明，不幸，中國今日的實際政治却成了這定例的反證。那末，權力真是效率的唯一條件嗎？那末，「效率高以權力大小為比例」，這公例果真可靠嗎？

「有權力即有效率」，抱這種見解的人，實際等子認定「權力通神」，等子迷信權力即是神力，有了權力則無事不可做通。在國家政治上，權力兩字，即可解決一切，權力這條條件具備，即可發生最高最大效率，這未免把政治看得太簡單。上面說到，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政府是管理衆人之事的總機關。具體說些，千萬萬公務員在公家無數機關工作，這就是政治。這裏，姑再用「迅速敏捷」這通常見解做效率兩字定義，那末，效率之高低最少與這兩事有關：（一）機關組織的優劣；（二）公務員選拔的優劣。這散千萬萬公務員，關閉無數公家機關，當然國家整個政府不存在，當然沒有了政治。更談不到政治效率。照此說來，政法效率只能從千萬萬公務員及無數公家機關的工作上總能表現。到此，我們就可提出這些問題：（一）政府最高領導者有了偉大權力，就是機關組織優良的保證？政府最高領導者有了偉大權力，就是公務員選拔優良的保證？誰能給這些問題以正面的答覆？再拿中國舊的政治來說，皇帝是有權的，他是實際的獨裁者，他有無限的用人權。唯其有用人全權，他可以親賢遠佞，他亦可以親賢遠佞，他有無限的組織權。唯其有組織全權，他可以興序，建學校，行選舉，定制度，他亦可以造肉林，築酒池，求仙島，修宮室。列朝末季的皇帝，用人則親佞遠賢，官官女禍外戚三患齊舉，做事則緩急倒置，荒淫奢侈耗費三患俱全。權力是政治效率的保障嗎？惟其權力不是政治效率的保障，古人纔有下面這類話：「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這些話是中國民本政治的基礎。民本政治思想的產生，在我個人看來，正是古昔獨裁政治的反響。中國儒家所倡的民本政治與西方的現代民主政治，固非一體，其精神却相符合。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之產生，又何嘗不

是專制政治的巨變？在人類政治歷史上，「有了政治權力即有政治效率」，這話並沒有保障。唯其沒有保障，古人纔尋找政治上比較安穩平妥的新道路。到這裏，我們又要回到當前國際及國內的實際政治來。希特勒這次一舉勝法，大家以為德國政治是迅速敏捷，德國政治有優良的效率。然德國政治效率的來源，果實在權力兩字？希特勒的勝利，固然靠他的轟炸機，降落傘，摩托車，然而閃電戰的成功，同時亦依賴德國千千萬萬公務員在無數公家機關的工作。換句話說，希特勒的成功，同時依賴德國政治機構的優良與公務員制度（吏治）的優良。有了德國的政治機構與吏治制度，希特勒纔能使德國政治發揮效能，纔能使前方軍事有閃電式的成功。德國的政治機構與吏治制度，希特勒或會運用他的權力有所改進，然而德國這兩個法寶，並不是希特勒的權力創造出來的。從畢斯麥的時候起，德國的政治機構與吏治制度已有了良好基礎。倘沒有這兩件法寶，希特勒的成功果能這般迅速敏捷？希特勒在政治上當然亦有他可以敬佩的地方。他並沒有因為納粹黨上台，讓黨治摧毀這兩種制度的基礎。他並未為黨員因人設事，添設許多重複機關，冗雜冗員。他並未將許多親戚私人，置於崇高重要的地位，使吏治流於貪污耗費。對政治機構及吏治，他保存了普魯士遺傳下來的基礎。不止如此，他還貫注了奮發有為的新精神到這些制度上去。這是德國政治能發揮效率的癥結。

易地而居，倘把中國的政治機關和中國的吏治移置于德國，機關重疊繁複，吏治貪污鬆懈，儘管希特勒有無上的權力，希特勒能夠有閃電戰的成功嗎？用個譬喻來說，工廠裏的機器靠電力發動。但工廠中出品的多寡及優劣並非完全視電力大小為轉移。廠中機器各部份之結構，廠中工人技術優劣與工作精神好壞，都有關係。倘機器陳舊而工人腐敗，則雖用無限量電力以求增高工廠出品，亦是無效。權力並不是效率的唯一條件。沒有權力，固然不能有良好的效率。有了權力，同時不能發生良好效率的具體實例亦不少。目前中國政治不幸就是這樣的實例。天，事不能從一面或一隅去觀察去判斷。

我這篇文字，主要點在說明政治權力不是政治效率的唯一條件。我承認政治權力是政治效率上必需條件之一。沒有政治權力即沒有政治效率。但有了政治權力而依然沒有政治效率的具體實例亦不少。倘遇到這種政治環境，那末，補救之道不應專在權力兩字上著想。應在其他必需條件上加意以考驗。例如，機構完整嗎？人事妥善嗎？這都是值得考驗的事件。工廠的機器不加

修理，工廠的人事不加整頓，只專增加發動電力，只專增加無限度發動電力，以求工廠中出產迅速敏捷，效率增高，其結果或至全部工廠的毀滅。

這裏，還有幾點大家應注意。第一，政治權力有個盡頭。政治權力有「增無從再增」的盡頭。什麼是增無從再增的盡頭？大家承認希特勒是獨裁者，是享受無上權力的人。所謂無上權力者即希特勒的權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他可以聽其意志為所欲為。到此即算盡頭，到此即算「增無從再增」。那末，在中國談政治的人，就要注意這一點。如今站在中國領導地位的人，他的權力是不是受了任何法律的牽制與限制？他的權力是否能夠聽其意志為所欲為？倘答復是正面，那末權力亦已達到盡頭，那末是「增無從再增」。果爾，那末在中國再主張增加政治權力以發揮政治效率，是不着癢處，不中脈案之談。第二，政治權力是極危險的東西，善用之可以為善，錯用之可以為惡。為善為惡程度的大小却以權力大小為轉移。無限度權力可以為無限度的善，亦可以作無限度的惡。中國政治歷史上有堯舜，但亦有桀紂。有高祖光創業之主，亦有平哀靈獻亡國之君。同志權力，運用的結果，在中國政治歷史上却有各式各樣不同。那末在國家政治上，只是增加政治領導者的權力，就可解決國家一切問題嗎？就可使國家轉安為危轉敗為勝嗎？宋之亡於元明之亡於清果宋明末年皇帝權力不夠嗎？人類政治是這般簡單嗎？

這裏，我不願引起讀者誤會，認我反對政府及政治領導者應享有政治權力。我只說明在政治上，政府有了無上政權，不能保障國家一切問題即有了美滿良善的解決。我只說明，政治權力不是政治效率唯一的條件。倘進一步談到效率兩字經濟的及道德的意義，那末政治權力更不是發揮政治效率的担保。政治效率倘是公家事務管理上時間，精力，及物質的節省，那更是政治機構與吏治制度的問題。政治學如今是一項嶄新的科學。權力應如何分配始得平衡，機構應如何調整始趨於簡單與靈活，人事應如何管理始足以澄清貪污，整肅官紀，增進技術培養精神，如今都是專門科學。這絕不是增加政治領導者無限權力；即可解決問題。並且中國以往及現在的政治事實，會證明政治領導者已經享有過無限權力並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再進一步，談到效率在道德上的涵義所謂社會以少量的犧牲，換取多量的福利，這種政治效率，更不是專事增加政府權力，可以達到目的。談到這種效率的定義，那末，今日德國希特勒之所作所為，是政治效率抑是政治罪惡，且根本成了疑問。



德國人民應希特勒受選取無上政治權力是人民的聰明抑是愚蠢，亦根本成了問題。德國一舉勝法，報凡爾賽條約之仇，雪凡爾賽條約之恥。德國民族今日固極痛吐氣。整個國家窮兵黷武，以全世界人類為仇，在全世界人類文化上開倒車，以發揮一個獨裁領袖的英雄思想，以滿足一個獨裁領袖的稱霸欲望，此果德國民族前途之真實福利？果爾，政治效率果又何在。

如今我們再回到前面一句話來，政治效率亦不能不靠政治權力。有權力不一定有效率，但無權力却一定無效率。這話我們承認。不過，只有獨裁政治能託有權力，民主政治卻不能有權力嗎？研究政治的人就知道，美國總統的政治權力即在現任羅斯福總統就任以前已增加了好幾倍。羅斯福就任總統以來，政府權力的權限增高，更不用說了。在今日美國，從羅斯福總統直對國內一切政治家，絕無總統權力不夠的議論。無論在國防上及內政上，美國總統如今真是可以為所欲為。在我個人看來，如今美國羅斯福總統與德國希特勒，均是有極大權力的政治領袖，其真正不同點即在權力取得與維持的方式。獨裁者的政治權力，取之以暴力，守之以暴力，而民主領袖的權力，取之以法律守之以法律，分別如此而已。若謂獨裁領袖能有權力，僅能運用權力以增高政治效率，民主領袖即不能有權力，即不能運用權力以增高政治效率，此實不盡事實之論。

或者有人要說，民主的政治領袖固能有偉大權力，但在民主國家，政治領袖要顧慮民意，要尊重法律，其取得權力的時間比較遲緩，時間比較

遲緩，即可坐誤時機。這話彷彿有理。須知政治的對象是人。政治權力的基礎，無論是民主政治或者獨裁政治，都建築在「人民滿意」這條件上。比較遲緩的時間，得到人民真誠滿意，這種權力實可貴，這種權力能耐久，能延長。以暴力取之，以暴力守之，這種得來的權力，倏倏成功者固然有人，陷國家於革命內爭，以至無可收拾的實例亦不少。「欲速則不達」，這是古人從經驗上得來的教訓。希特勒的閃電式的成功，有很複雜的原因，絕不是權力可能的實例，絕不是速則必速的定例。這是我們談政治者絕對不可忽視之點。

綜合起來，我這篇文字的主旨有這幾點：（一）權力不是政治效率的唯一條件，所以有了政治權力不一定即有政治效率；（二）中國缺乏政治效率，原因不在缺乏政治權力，因中國的實際政治是獨裁，中國政治權力已到「增無從再增」的地位；（三）民主政治可以有偉大的政治權力，其取得權力的時間雖然比較遲緩，但此種權力較真實，更能耐久，更能延長。最後，我還願很誠懇地喚醒國人注意，為國家謀大計，眼光不可太勢利，更不可被希特勒閃電暫時成功所迷惑。大家要看個清楚明白，希特勒之所以成功，絕不專靠「權力可貴」四字，而增高權力，更不是中國今日對症之藥。中國今日政治效率應急謀提高，這是舉國一致的共同意見。專靠權力絕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政治機構力求健全，政治人才力求集中，居上者大公無私，居下者公忠體國，其庶幾乎！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 論 翻 譯

賀 麟

中國近二十年來的翻譯界，可以說是燕窩沉寂到了極點了！最奇怪的就是二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大鑿疾呼要吸收西洋的學術思想，要全盤接受西洋的近代文化，然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介紹西洋學術文化的基本工作！翻譯事業，反而蕪蕪不堪，消沉已甚。離開認真負責，堅實嚴密的翻譯事業，而侈談移植西洋學術文化，恐怕我們永遠不會有自主的新學術，西洋的真正文化也永遠不會在中國生根。嘗細考所以致此的原因，大約有三：一因上焉者自矜創造不屑翻譯。故爾沉寂。一因下焉者學問語言之培植不夠，舉國操觚，視翻譯為易事。故爾蕪蕪。三則因缺乏嚴正的同情的翻譯批評，以

鼓勵好的翻譯，糾正壞的翻譯，也足以長養這種蕪蕪和沉寂的局面。然而試就根本處着想，我們不能不說，學術界多數人對於翻譯的性質和意義，缺乏真正的了解，為中國近年來翻譯事業之不振作的主要原因。所以要討論翻譯問題，我們首先要進一步討論翻譯所包含的哲學意義。這就是說，我們要窮究翻譯之理，要考查一下，在理論上翻譯是否可能。大概帶神祕或神祕主義的哲學家多認翻譯在理論上為不可能。譬如有神祕主義趨向的柏格森，在他的形而上學導言一文中，便提到翻譯之不可能。因為他說那直覺的神祕的生命之流或精神境界，是那樣的豐富，活潑，變化無方，

而理智的概念，和語言文字等，又是那樣的枯燥，呆板，機械。以呆板機械枯燥的概念符號語言文字，如何能表達或翻譯那豐富活潑流動的生命和精神的內容？他的意思是說，自己尚無法用語言文字以表達自己自得的直覺的意義，他人更無法用他們的語言文字以傳達或翻譯我自己的意思。換言之，「言不盡意」。意，神秘不可道，自己之旨尚不能盡自己之意，他人之言，更無法盡自己之意。故翻譯不可能。落子言詮已是下乘，言詮之言詮，語文之翻譯，更是下乘之下乘。

這顯然是誤解「言意之辨」的不健康的思想。蓋意屬形而上，言屬形而下；意一，言多；意是體，言是用，誠是意與言間的必然的邏輯關係。在某意義下，言不盡意，意非言所能盡，亦係事實。但須知言雖不能盡意，言却可以表意。文雖不能盡道，文却可以載道。蓋言為心之聲，亦即言為意之形。意思枯燥，言語亦隨之枯燥，意思活潑，言語亦隨之活潑。意思深邃，言語亦因而含蓄。未有心中真有意而不能用語言文字傳達者，凡絕對不能用語言文字或其他方式表達的意思，就是無意思。即有時無語言文字之方便以傳達自己的意思，則果有真情真意蘊于中者，亦必有態度舉止行爲以形于外也。而從行爲態度以表達意思，較之用語言文字以表示意思，反而更爲具體有力。且就言不盡意而論，如意指如泉源之深意，真意，這意而言，則意乃是一個無盡藏的形而上之道，自非形而下之言文所能表達完盡。但就經驗中的事實言，有時言實可盡意。有時言浮于意。有時他人之言，實完全可以表達自己之意。有時自己因用語言文字表達自己之意時，反而引出新意。有時因聽見或看見他人用語言文字表達自己原有的意思時，亦可引起自己的新意。有時又因用語言文字去表達他人的意思，反而引起自己的新意思。最顯著普遍的事實，就是有時他人表達自己的意思，反而比自己表達自己的意思更清楚，更詳盡，更切當。（以上各條皆是列舉心理事實，望讀者各自從經驗中去尋求實際的例證）。這種能表達他人固有的意思較他人自己尤表達得清楚詳盡切當者，將叫做代言人。大政治家就是民意的代言人。大哲學家和文學家，就是時代意思或民族意思的代言人。

現在我們慢慢就可明瞭翻譯所包含的哲學原理了。因爲意與言或道與文是體與用一與多的關係。言所以宜意，文所以載道。意與言，道與文間是一種體用合一，而不可分的關係。故意之真妄，道之深淺，皆可于表達此意與

道的語言文字中驗之。一個人如能明真恆之道，知他人之意，未有不能用相應之語言文字以傳達之者。今翻譯之職務，即在于由明道知意而用相應之語言文字以傳達此意表示此道。故翻譯是可能的。因道是可傳，意是可宣的。再則，意與言道與文既是一與多的關係，則可知同一真理，同一意思，可用許多不同的語言文字或其他方式以表達之。譬如，我心中有一個意思或道理，我可用本鄉的土話以向鄉人表達之，用北平的官話以向國人表達之，用古文或白話文以向新舊的人士表達之。亦可用英文德文或法文以向外國人表達之。意思惟一，而表達此同一意思之語言文字可以多種。言之多，不妨害意之一。今學術上同一的客觀真理，當然可以用多種語言文字以表達之，而不妨害其爲同一之真理。今翻譯的本質，即是用不同的語言文字，以表達同一的真理，故翻譯是可能的。

從這一番關於翻譯可能的哲學原理的討論，我們可以解釋出下列兩層道理：第一、翻譯既是以多的語言文字，去傳達同一的意思或真理，故凡從事翻譯者，應注重原書義理的了解，意思的把握。換言之，翻譯應注重意譯或義譯。不通原書義理，不明著者意旨，而徒斤斤於語言文字的機械對譯，這就根本算不得翻譯。真切理解原文意旨與義理之後，然後下筆翻譯，自可因應裕如，無有滯碍，而得到言與意與理合一而平行的譯文，而且可以因原書所包含的意與理之新穎獨創，而獲得一與之相應的新穎獨創的譯文。故由翻翻而得到創造新語言，新術語，新文體的效果，唯有意譯方可獲致。不從意思與義理着力，徒呆板去傳譯語文形式的末節，只能敗壞語文，使語文生硬，晦澀，詭怪。第二、凡原書不能表達真切之意普遍之理，而只是該國家或民族的特殊文字語言之巧妙的玩弄，那便是不能翻譯，不必翻譯或不得翻譯的文字。如中國六朝的駢體文或西洋許多玩弄文字把戲的哲學著作，便是屬於這類不能，不必，不值得翻譯的文獻。談到這裏就牽涉到詩之能否翻譯問題。就詩之具有深切著明人所共喻的意思情緒真理言，則這一方面而的詩應是可以利用另一種文字表達或翻譯的。就詩之音節形式之美，或純全基於文字本身之美的一部分言，那大半是不能翻譯的，要翻譯時，必須於深切領會到原詩意義情境之美後，更新創一相應的美的形式以翻譯之。換言之。原詩是出於天才的創造，精神的感興，譯詩亦應是出於天才的創造，精神的感興。原詩具有文字本身之美，譯詩亦應具有文字本身之美。我揣想英詩人卡

浦曼所譯的荷馬，大約是屬於這一類的。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承認詩是可以翻譯的，一方面又要承認詩之可譯性是有其限制的。譯詩所需要的創造天才特別多，所以是特別困難的。但無論如何我們要拒絕詩是絕對不可翻譯的謬說，因為那是出於神秘主義，那是懶人避醜的技術，於文化的傳播，於詩人所宣洩的偉大情意與真理的共喻和共賞是有阻礙的。總之，我們要把握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真義。心同理同的部分，才是人類的本性，文化的泉源，而此心同理同部分亦即是可以翻譯的部分，可以用無限多的語言去發揮表達的部分。彼玩弄光景，沉醉於神奇奧妙的境界的神秘主義者，執着於當下赤裸，飄忽即逝的感覺的感覺主義者，或拘滯於語言文字之形式或技巧之末節的形式主義者，皆是不明瞭體用合一，心同理同的心學或理學的人，故其立說不足以作翻譯可能的理論基礎。

此外還有一個關於理論方面的問題，就是關於翻譯本身的意義與價值問題。這個問題又分兩方面，一是譯文絕對不如原文問題。因為一般人大都認為譯文乃是改製品，做造品，抄襲品，絕對的不如原文之真，之美，之善，譯文與原文有似水與酒的關係。原文意味深厚，譯文淡薄無味。所以譯文都不值得有學術興趣的人去讀的。譯文只是對不通原文的人說法。假如一偏已懂英文的人，再去讀中譯的英文書，是可恥的，至少是無益的。這當然是經驗中的事實，而現下國內出版界所流行的譯品，也的確使人得到這種印象。但我們須知，這個事實只是一種不良的現象，須得改變，減少此現象。這並不能涉及譯品的本質。我們不能說，凡譯文絕對地，必然地普遍地，不如原文。事實上比原文更美或同樣美的譯文，就異常之多。譬如歐復譯的天演論，羣已權界論及羣學律言等書，據許多人公認均比原文為更美。最有趣味值得注意的事實，就是一般人所讀的宗教上的聖經，差不多完全是譯文。德國人大都是讀馬丁路得所譯的新舊約，英美人大都讀英國詹姆士王朝時的英譯本新舊約。只有極少數神學家或聖經版本專家才去讀猶太文的舊約，希臘文的新約。而且無論就那方面，都很難說英德文譯本的新舊約不如猶太文和希臘文原文的新舊約。中國一般唸佛經的人，更是唸的翻譯本，而這些翻譯本也許有較原文更好的地方。而且據我所知，西洋的學者大都兼讀或參讀原文與譯文。譬如，能讀希臘文原文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之著作的學者，本沒有不參讀或兼讀其本國文之譯文的。所以我國現下通西文的人大都不讀

中文譯本或不參讀中文譯本，乃是中國翻譯工作尚未上軌道，許多重要典籍，均乏標準譯本的偶然現象，並非永久的常態。就哲學典籍而論，如康德黑格爾的著作，其原文之晦澀難讀，乃人所共苦。則關於康德黑格爾的著作的譯文，比原書更暢達，更明確，更詳盡，（我的意思是說，譯文須附加註釋導言等，故可更詳盡。）乃是很可能的事，可惜關於康德黑格爾的主要著作的英譯本，大都不甚佳，若我國有志譯事的哲學者，能精心直接根據德文原書，譯成中文，則將來中譯本的康德黑格爾的著作，無論就信達雅言，皆勝過現行的英譯本，乃是極可能之事。蓋譯文與原文的關係，在某意義上，固然有似柏拉圖所謂抄本與原型的關係。而在另一意義下，亦可說譯文與原文皆是同一客觀真理之抄本或表現也。就文字言，譯本誠是匠者之翻抄本，就義理言，譯本與原書皆係同一客觀真理之不同語文的表現。故譯本表達同一真理之能力，誠多有不如原書者，但譯本表達同一真理之能力，有時同於原書，甚或勝過原書亦未嘗不可能也。

關於翻譯工作本身價值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說翻譯只是傳達他人的思想，為他人的學說作傳聲筒的機械工作。從事翻譯者大都是沒有堅強的個性，沒有獨創的思想學說的人。故翻譯之事乃是創造天才所不願為不屑為的工作。就表面上看，這顯然是事實，而且的確是很普遍而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執着此種事實，認為是絕對無例外，且因而忽視翻譯工作，那就會成爲阻礙學術之進步與發展的淺妄之見。第一，翻譯而能成有準確的傳聲筒，如良好的廣播機或收音機，那已是難能可貴，值得嘉獎鼓勵的事。蓋文化學術上的傳聲筒或廣播機，實有其急切普遍之需要，不可一日或缺，不可一地或缺。此不過單就翻譯在文明社會中之實用價值而言。其次，就學術文化上之貢獻言，翻譯的意義與價值，在於華化西學，使西洋學問中國化，灌輸文化上的新血液，使西學成爲國學之一部分。吸收外來學術思想，移譯並融化外來學術思想，使外來學術思想成爲自己的一部分，這乃正是擴充自我，發展個性的努力，而決不是埋沒個性的奴役。黑格爾盛稱道馬丁路得得之翻譯新舊約成爲德文，認為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因爲他說，直要到我們對於一個東西能用自己的國語（Mother-tongue）表達時，這個東西才會成爲我們的所擁有。有權利利用自己的語言來說話來思想，就是一種真實的自由。路得的翻譯，使德國人感覺到基督教非外加的桎梏，乃自己內心中固有的財產。所

以若無新舊的翻譯的工作，他的宗教改革是絕不能完成的，這樣看來，翻譯外籍在某意義下，正是爭取思想自由，增加精神財產，解除外加桎梏，內在化外來學術的努力。第三，談到翻譯與創造的關係，我們亦須勿囿於片面淺妄的意見。我們須知有時譯述他人之思想，即所以發揮或啓發自己的思想。翻譯為創造之始，創造為翻譯之成。（摹倣與創造的關係準此。）翻譯中有創造，創造中有翻譯。一如註釋中有創造（如郭象之註莊子，朱子之註四書）創造中有註釋。（如莊子書中多註釋老子的地方，而周濂溪的太極圖及通霄，爲宋儒最新創之著作，但其本意乃在註釋易經中一些經文。）片面地提倡獨自創造，而蔑棄古典思想之註釋發揮，外來思想之介紹譯述，恐難免走入淺薄空疏誇大之途。誰不願意創造？但創造乃是不可欲速助長的。創造之發生每每是出于不自知覺的，是不期然而然的，是不能勉強的，不能自命的。

## 在生產戰線上的婦女（實業通訊）

任柱明

### 一、我們覺悟了

我們是西北的婦女。有的人因爲我們生長在「文化發祥地」而尊重我們，有的人因爲我們現在文化的落後而輕視我們。無論同胞們對我們作怎樣的想，在今天我們敢很大的告訴大家：自從抗戰的怒吼暴鳴以後，西北無數的婦女，已經被驚醒了。一方面很多先覺的婦女，正在做着模範的榜樣，發生偉大的發酵作用；而另一方面廣大的西北婦女羣衆，正在起來參加那支持長期抗戰的後方生產工作。

### 二、工合的領導

「工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這名詞我們在寶雞的人，是聽得爛熟的。前年九月在寶雞就發起組織工業合作社的工作，他們消極的目的，是廣收失業的工人，救濟流落的難民；積極的目的，是使這些渙散的個人變爲一種組織的力量，以從事生產事業，供給軍需民用。工合一到寶雞，到處貼着很醒目的標語，很清晰的寫着「發動婦女參加生產」，「男子上前線英勇殺敵，婦女應在後方努力生產」。西北的婦女是在這些像鑼錘似的呼聲中，結伴到工合辦事處去參加工作的。

### 三、沒有人能阻礙我

故與其修言創造，而產生空談淺薄誇大虛矯的流弊或習氣，不如在學術界養成一種孔子之「述而不作」，朱子之「註而不作」，支英之「譯而不作」的篤厚樸實好學的風氣，庶幾或可不期然而然地會有偉大的創造的時代的降臨。

中國的學術文化如要有堅實的基礎，盛大的發展，無論學術界人士和教育負責的當局，似須對於西洋學術思想名著的翻譯工作，予以認真的注意。如何審查流行的蕪濫的譯品，如何培植專門翻譯的人材，如何予有志於從事翻譯的學者以便利和鼓勵，似乎都是教育當局所當考慮的工作。至於若有所悟誠篤好學的青年朋友，因本文的激勵而能早下決心，培植深厚的學問基礎，以翻譯西洋學術上的名著爲終身志業，遠效吳師，近邁又陵，更是本人所馨香禱祝的了。

生產合作社是工人的組織，只有有生產能力的人，才能享有做社員的權利。在合作社裏，我們同是工人，也同是主人。一切工廠裏的剝削制度，和工頭的壓迫，是絕對不能也不會存在的。我們大家只有一個心，和兩個目的。這一個心，就是抗日救國的熱心；兩個目的，就是如何努力增加生產，堅強抗戰力量，和在民族解放中爭取婦女解放。

爲了西北的風氣太閉塞，和我們想有充分的機會鍛鍊自己工作及管理的能力，工合允許婦女單獨組織合作社，陝甘兩省會成立了廿六個各種業務的婦女生產合作社，在寶雞有十個，其中九個是紡織，一個是縫紉。

西北婦女參加工廠工作的機會，原來就是很少的。尤其是這種自主的經營的合作社，對於她們更是新鮮。大家都是爲了愛國的熱情，和工作的熱情，不顧一切艱難和阻礙，勇敢的踏上生產的大道。當然，問題不是單純的勇敢，就可以解決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勇敢，還要有方法。最初大家抱着無限的熱情，轟轟烈烈的跑到合作社裏。但是到了合作社以後，大家看見了紡紗機，皮帶和齒輪，不知如何才能使得她們動，看見了織布機，不知如何才能使梭子穿過那密密的線，看見了縫紉機，然而一使用，針就斷了。

### 四、努力訓練，加緊學習

在一個新的工作中，盲目的摸索，這幾乎是每一新工作初期難免的現象。大家自覺缺乏技術，不能勝任工作以後，即刻與農產促進會和許多同情婦女生產運動的人接洽，舉辦技術訓練班。去年四月廿日至六月二十五日我們辦了一班婦女紡織訓練班，有學生四十人，學生年齡係自十八歲至三十五歲，學生中有三十三個是貧難人，七個是其他省籍的。有一半原來不會讀過書的，有一半大概都會進過學校，或在家裏讀過書。我們訓練的方法分兩種，一種是學科，一種是術科。所用的工具，全是改良的半手工半機器化的機器。所用動力，除彈花機是用驢子拉以外，紡紗機和織布機，全用人力推動。每天上術科課六小時，學科課兩小時，早晨有柔軟體操唱歌，晚上經常的開晚會，有時舉行音樂，有時問題討論。在短短的兩個月當中，學會了生產的技術，同時還知道了許多大家過去不曾聽見過的事。現在許多簡單的報紙和書，大家可以讀。開會的時候，每個人都能輪流做主席，在工房裏做工時，技師也不會那麼着急的教大家，合作社的業務，也不至於因為大家是生手，而不能上軌道。大家和工合的指導員現在見了面，總是帶着勝利的笑容，蘊藏着無限的安慰。

接着我們又辦了第二期婦女紡織訓練班，第三期婦女紡織訓練班，女子職業訓練班，和四班紡織傳習班，一共訓練了九百六十人。我們創辦女子職業訓練班的目的，是希望給中等程度，有吃苦耐勞精神的婦女，一個較長時間的技術訓練，以為婦女合作社的骨幹，而奠定發動婦女參加生產的基礎。我們更希望女子職業訓練班，能發展成爲一個女子職業學校。第一期女子職業訓練班，規定學習期間是六個月，學生廿人，都有中等程度，學習技術，有縫紉和染織漂。現在還在學習期間，在學習的過程中，進步是非常迅速的。紡織傳習班，訓練的方式最簡單，訓練的時間，也較短暫，最長的是一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此種訓練班，專爲不能參加集體生產的婦女設立，在學習期間，也不集中住宿，每日白天上課八小時，晚上即可回家，我們選擇人口集中的地方，舉辦此種傳習班，陳列許多紡紗和紗毛的機具，任人學習，任人參觀，在學習期間，也不收任何費用，學會以後，自己回家去紡，有機子的更好，沒有機子的，我們可以借給她們，紡好的紗，我們有紡毛站或紡紗站，代爲她們運銷，同時我們還爲她們代買棉花和羊毛，參加傳習班學習的人，有九百人。

### 五、埋頭苦幹

想出力而不知方法，根據我們的經驗，這要算是最苦悶的事。如今我們已先後訓練了一千人，這一千人又帶會了許多的徒弟，現在正是埋頭苦幹的時候了！

十個合作社根據業務的性質和地域的關係，合併成爲四個合作社，兩個是織布，一個紡紗，一個縫紉，另外有一個紡紗站，四個紡毛站，兩個織布合作社，有一個有五十餘人參加生產，每日可織大布（十丈）十五匹，另一個有三十餘人參加生產，每日可出大布八匹或九匹。每日織成的布，除花布外，白布通送交聯合社轉交軍需局，作爲軍用，紡紗合作社，係用五十二個釘的改良紡紗機，利用水力發動，共有二十台機，每機每日可出紗兩磅到三磅，縫紉合作社參加生產的人，有五十餘人，在五月裏，一個月內會完成了軍包袱十萬條，現在又在趕製寒衣，每日可製成寒衣五十套。紡紗站參加紡紗人有一千人以上，每日每人平均紡成相當十六支的紡三刀，可收三千刀，四個紡毛站，每站有二千餘人紡毛，每人每日平均可紡成兩斤半可織軍毯的合股毛線，以八千五百人計，每日可收毛線二萬一千二百五十斤以上，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四個月內，完成了軍毯七萬條。在這個四個月內，整個工合西北區，完成了軍毯四十萬條，現在又奉令承製軍毯一百萬至一百十五萬條，又正是我們最好效力國家的機會，從去年到現在，經過訓練，如動員來參加生產的婦女，數目總在兩萬以上，以後工作愈加深入，參加的人，一定會增加。

由於婦女參加生產的結果，實發生了兩種一悲一喜的現象。平時在過年的時候，總免不了要發生搶案和盜劫，去年這種情形，特別少，另外有一種不好的現象，就是鄉下的大烟店，反而比平日生義興盛，門庭若市，我們調查的結果，是婦女的工作所得，往往不見得改善了她自己或家庭的生計，而方便了她的丈夫，而至於她的兒子抽大烟的機會，還是非常可惜的事。

### 六、人人爲我，我爲人人

這是合作最能動人的原則，婦女是具有最可愛的慈憐的人性，和最偉大的母愛的，自從婦運在實踐活躍以後，許多社會福利事業，都跟着建立起來，甚至於普及教育工作，我們的努力，還超過了縣政府的力量。

我們在實業會發動了八百以上的傷兵參加生產工作，現在已組織了四個殘廢傷兵合作社，一個製革，一個製鞋，一個製燭皂，一個編織，每個合作社有七八十個社員，還有許多傷兵，是由我們借給機具在醫院，或者殘廢院裏工作，一般傷兵，他們平日的的生活就是靜養，政府每月照他們原來的階級發給薪餉，其實有許多傷兵，特別是進了殘廢院的傷兵，他們的傷口已經好了，雖然殘廢了不能拿槍，但他們仍舊能够做許多工作，甚至於可與常人無異，像這樣的情形，若不能有相當的工作，一方面固然是國家的損失，同時身壯力強，而無工作，精神上是異常苦悶的，更何況富有最熱烈愛國的心腸的榮譽將士呢！負傷將士組織到生產隊伍裏去，這是目前迫切而且重要的問題！

我們也會訓練了和組織了一千以上難民參加生產工作，她們會每日紡成了二千多斤毛線，幫助趕製軍毯，她們也會大力的爲軍隊拆洗棉軍服，這些難民原來是靠着做些零工，如男的推小車，女的擰紗籃子，看香針線，到街上去補破舊，小孩多半是在街頭乞食的多。他們自從參加了經常的生產工作以後，生活是有規律而且改善了許多。

爲了不忍見難民兒童，在街頭流浪，和救濟許多失學的兒童，我們在實

## 舊詩與新詩的節奏問題

(F)

我們在本文上篇中已說明舊詩的成形與演變，完全本乎中國文字的自然節奏。從詩進展到曲詞，已有使用語言與節奏諧合之勢。這種新的諧合絲毫不感勉強；雖然音組與音組的字數時或不同，但我們若了解中國詞的組合性及單音字之無礙於節奏，即可了解此種現象在語言文法語調上反是最自然的。新詩不過是更進一步使當代日用語言與文字的自然節奏更切實地吻合而已。試舉新詩一例：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漣。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盡你的——廢棄——殘羹。（聞一多：死水第一節）

此一開四行的詩，每行很自然地分爲四個音組，每音組的組成雖有二字

難縣城及城郊辦了五個中心小學，兩班幼稚園，收容了六百以上的學生，還辦了十二班兒童識字班，收容了三百多學生，我們也辦了十二班婦女識字班，有學生二百五十餘人，還有什麼街頭壁報，民衆夜校，各村巡迴宣傳，都是我們經常的工作。

做了這些工作，我們的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也許是被關心的一個問題。我們的錢有幾個來源，組織合作社的資金，當然是工合貸來的款，技術訓練，辦學校，幫助傷兵和難民，這些費用，有的是由於農產促進會的幫助，有的是熱心的人士慷慨的捐款，有的是由遠處的雙律賓、英國和美國捐來的。

### 七、建設經濟樹防，抵抗日本人

實難是一個小地方，但，自抗戰以來，她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七事變以前，縣城及周圍十里，只有五千人左右，現在已增加將近十萬人口，以前連小工業也沒有，現在已經有七十三個工業生產合作社，還有一個大規模的紗廠，和一個大規模的麵粉廠，還有許多小型的私人經營的工業，也遍佈在實難，實難現在已是後方的一個經濟堡壘，她已具有十分的勇敢和堅固的基礎，準備着敵人從那裏來，我們仍將她打回那裏去！

孫毓棠

之不同，但我們若了解本篇所分析的，便知其無關重要。詩中的音組與字的配合，使我們讀起來感覺很自然。讀這四句七言詩，和讀四句七言詩，在節奏上簡直完全一樣。所不同者，這四句詩是白話的，容易懂，中間有兩個「的」字，一個「些」字而已。反對新詩的人絕對不能說舊七言詩是詩而此詩不是詩，因爲此詩節奏的骨幹與七言詩尋不出絲毫不同之處。如果有人說此詩中有「的」字「些」字，所以不是詩那是他好古非今，喜觀深惡簡易，但愛古董不解生活，不足以談文學。文學要的是時代生活情緒的嶄新的表現，必需用最淺近最習用的語言。如果這一點被否認了，那麼我們日用的語言的價值便得被否認了，而世界上便有大部分的文學也得被否認，因爲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學都是用當代說話的語言寫成的。實在講起來，新舊詩的不同處只在一個用的是當代最自然的語言，一個是模仿古老的做作的語言而已。有些舊詩

詞只重變幾個字，便可成新詩；新詩一改詞句，即可成舊詩。原因這是由於他們根本的節奏絲毫無不同處。節奏如一條河道，新舊詩原是一條川流。我們再從另一方面看，新舊詩又似乎有一大不同之點，即白話詩用的是「語言的節奏」，而舊詩詞用的是「吟詠的節奏」。我們得承認我們平日所說的話，有一種自然的節奏蘊藏於其中。例如：

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冤！裏頭！你有話，索興說了，大家明白，豈不！了！了！了！呢！（紅樓夢第一〇三回寶釵語）

以上寶釵這幾句話，很自然的分成了十一個音組，語調說起來高低緩急恰恰合適。分音組的方法自然有因其高低快慢輕重之不同，意義上也發生很顯的區別，如「你原是個爽快人」，若著重在「你」字，即可讀為「你！原是個！爽快人！」等。再如「你問問老張！幾時來！可成爲！你問問！老張！幾時來！或！你！問問老張！幾時來！等。這都由於說話時表示意義的重音的所在之不同，緩急輕重之不同，而音組的組成上也產生差異。但無論如何，我們說話之中，自然地蘊藏着節奏，是可公認的。白話詩所用的即是這種說話的節奏。每一句詩是一句說話，詩人好比是一個會說話的人，懂得說話的節奏之音樂性的人，他的工作即是如何把雜亂的說話的節奏安排、配合、組織起來，使之成爲一種悅耳的詩的節奏，他之把雜亂的說話節奏「美化」而成爲詩，正如音樂家把宇宙中雜亂的聲音組織起來，「美化」而成爲樂譜一樣。這就是詩人創造的藝術。

撐着！油紙傘，！獨自！  
彷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寞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戴望舒：雨巷第一節）

這詩的節奏和調子，讀起來極近我們日常說話的節奏了；纏綿的情調即自此節奏中透露了出來。卞之琳還有詩說「簡直完全是說話」。新詩用的節奏即是以此種自然的說話的節奏爲節奏，詩人的工作不過對此加以一種安排，配合組織，美化的手續而已。他可以讀，可以念，念時與說話完全相同，自然的節奏之美即蘊藏於其中。

舊詩所用的則是吟詠的節奏，所謂吟詠的節奏，即便於音樂諸台，便於吟詠歌唱，他不完全不是說話的節奏。我們很難找出一句話恰好是一句七言五言詩。他比說話的節奏來得齊整而有規律，然而只能吟詠歌唱，不便念，至少說不能念得和說話一樣，他是人爲的，非自然的。再進一步，至少可以說是不合時代語言之自然性的。

詩裏的節奏，從這方面講，到底應該用「說話的節奏」還是「吟詠的節奏」呢？這個問題至爲複雜，得從多方面——如心理的，音樂的，語言文字的

社會的，文學的，歷史的，——去仔細探討，才可有個完滿的結果。在這篇短裏我們無暇詳論。但有幾點我們是可以同意的。第一，文學必需運用當代最自然的語言，才能表現出最切身的幻想情緒感覺與經驗，二十餘年來新文學所要求的就是這偶。如果我們承認以白話寫小說比用文言來得親切，那麼同樣地，用白話寫詩也自然比用文言來得切合時代。第二，文學中忌諱濫調與死格式，要的是新的詞藻新的物象。舊的詩詞早已成了一套僵成了化石的格式，一團過了時的「時代的詩情」，新的酒新的精神已放不進這舊的皮囊。欲求新的詞藻新的物象的運用自如，非得有新的格式與新的語言不可。第三，我們要分別吟詠的節奏與說話的節奏之價值，似乎從詩與歌的分別上即可尋找。我們不能說一切能唱的歌都是詩，不能唱的歌即不是詩。詩與歌是截然兩個區域，重音樂而輕詞藻的是歌，因此歌得犧牲文字的自然性以求入樂。重文字而不顧歌詠的是詩，因此詩只利用語言文字中的音樂的原則，而不強使音樂來攪擾語言文字的自然性。歌是唱的，詩是念的。歌可以本乎吟詠的節奏，詩必需本乎自然語言的節奏。

總括起來，我以爲舊詩詞與白話詩，二者根本的節奏都是以中國文字本身上自然的節奏爲基礎，他的發展是在一條道上的，並非截然不同的兩個國度。所不同處，只在一個是運用當代日用的自然語言，一個是運用多年成爲格律的人爲語言上。因其語言運用不同，故節奏上一是說話的節奏，可念不可吟的；一是吟詠的節奏，可吟不可念的。而依我的意見，吟詠的節奏在今日已經只能用於歌上，而不能用於詩上。因此，今日的詩，必需要運用說話的節奏，而今日的詩人的責任，便是要在中國語言的節奏中去尋找，去開發，去創造最自然的今日的中國語言之美。

我們若澈底了解了舊詩新詩二者兼有的中國文字之根本的節奏，及新詩所運用的說話的節奏，我們對於「讀」新詩便不會感覺多少困難，也可了解新詩原與舊詩一樣是可「讀」的，不過讀舊詩的「讀」是「吟」的意思，而讀新詩的「讀」是「念」得和說話一樣罷了。例如：

暮秋的一田野上！照着！斜陽，  
長的！人影！移過！路中央；

乾枯了的！葉子！風中！歎息，  
飄落在！還鄉人！舊的！軍裝。（朱湘：還鄉第一節）

此兩詩每行四音組，詞藻全是很自然的白話。第一行中的「的」「上」「着」「字」，第二行的「的」「字」，第三行的「了」「的」，第四行的「在」「的」「字」，只有文法意義而無礙於節奏的「單音字」。如果我們把第一行的三個單音字都取消，便成了一暮秋！田野！照！斜陽！，與七言詩句的節奏全無分別。然而只用這七個字，便不是我們自然的語言了，說出來人家便不大明白，還不如「暮秋的一田野上照着斜陽一來得清楚。而其中三個單音字，按我們平時說話的習慣，也是「一帶便過去了」的，所以讀成「暮秋的一田野上！照

着「斜陽」，對於一個對節奏略有感覺的人也應該絲毫不感到累贅或痛苦吧？而且這些單音字還可以懸起一首七律，也許他反而覺得其中缺少着這一類的說話的節奏的人，忽然讀起一首七律，也許他反而覺得其中缺少着這一類的單音字來填補文法上的不足及節奏上的單調。再舉一例：

如今一却是——黃昏，  
我站在——作頭——望——

輕風——捲來——一層  
雨，——遮沒了——天光。（陳夢家：雨第二節）

這節奏極近五言詩，而他却是十足的白話，節奏是十足的說話的節奏。第二行的「望」字單字一音韻，反可加強了望的情緒；而第三行未完的一「雨」字，轉放在第四行上，加強了雨的印象與感覺，這更是舊詩中不能用的技巧。中國文字好處之一就是富於暗示性（Suggestiveness），舊詩詞中固然已經借重他很多，而新詩中因其運用更自如，他的效力也就更大。

本着情緒與感覺，自然地隨着語調的緩急與呼吸的快慢，來安排一句的節奏，是詩人最重要的自由，也是詩人藝術的創造。舊詩詞在格式與韻脚上多少給這自由加了限制。新詩在這方面的解放是可喜的。他可以安排成：你看——那裏——神仙似的——一對——男女，挽着臂——踏着那——軟濕的——沙汀，誰也——想不到——故意——躲深了——脚印，爲着——可能的——第二次的——追循。

這種長而緩的（爲了敘述）沉着的節奏與這種

無邊的——靜  
溫死，——慈祥，  
——虹影  
——垂自——寫蒼  
五色，——輝映……

幸福的——辰光！（梁宗岱譯幸福的歌）

輕快的節奏對照起來，着實是舊詩詞中不易尋到的創造的自由。這種舊詩詞中不易找的新式句子的節奏依然是可以念的，是本乎中國文字自然的節奏的產物，絕不是從外國學來的。

由以上我們的分析，也可看出新詩雖不能如舊詩的一樣之可以「吟」，但他却也很自然地可以「讀」，用說話的節奏來「讀」。不過今日新詩壇上，有一個不得不引爲遺憾的事，就是有些寫新詩的人並不從這簡單最明顯的基本原則下手，他們以爲隨意寫寫就是詩。他們以爲新詩只要情感，無所謂格式。最初倡導新詩的人犯了這毛病，而今日寫詩的人仍未擺脫這病。他們甚至於不知道節奏爲何物。他們忘了「詩」究竟還是一種以文字爲工具的文學作品。他們不知道節奏，所以詩中也便沒有節奏。沒有節奏的詩稱爲詩，正好像沒有骨路的人稱爲人一樣，是不會有生命的。大約也就因爲如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雲南圖書審查委員會審查證警字第二六七號

今新詩壇上沒有節奏的詩太多，所以大家以爲新詩不但不能讀，而且不是詩。不過我們要說，沒有節奏的詩和不懂節奏的人所寫的詩，根本不能算是詩。（完）

### 本期撰者

在這各方正高談經濟建設的時候，如何使教育與經濟打成一片，實一種重要的問題。陳友松先生是一個對經濟學有特殊研究的教育行政學者，現在以專家的資格，對這個問題加以評論，實應特別重視。陳先生是西南聯大教授，在本刊常有文章發表，是讀者所熱識的。

我們如要樹立起中國的學術基礎，我們必先努力於翻譯的工作；這已是一種公認的定論。但近年來翻譯的事業却異常蕭條沉寂，這真是一種不良的現象。現在賀麟先生從學理的立場，對這個問題加以精確的分析，實是任何注意中國學術前進的人所應注意的。

凡到過陝西寶雞去的人，想都會注意到那裏的工業合作運動和婦女生產運動的。西北婦女生產運動，據我們所知，較任何其他地區的婦女生產運動都進步。本期我們登出這個運動的推動者任柱明女士的通訊，詳細敘述西北婦女生產運動的情形。任女士在「工合」初到西北時便到了西北。西北婦女生產工作之有今日，可以說是任女士的功勞。羅隆基和孫毓棠兩先生都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

### 今日評論 每星期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園通街六十七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總經售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香港以港幣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